

[秦汉文史研究]

# 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 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李 莎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乌桓、鲜卑部族最初属于东胡联盟,东胡破灭后,余部逃往乌桓山和鲜卑山,开始以乌桓、鲜卑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西汉武帝反击匈奴后,一直被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族逐渐南徙,靠近汉边。考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与汉匈力量的转变密切相关。此外,他们长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汉化较深,又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迫使其不得不南下寻找适宜的牧场。乌桓、鲜卑南下附汉,对汉匈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汉代;乌桓;鲜卑;南迁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2)03-0035-05

## On the Reasons for Wuhuan and Xianbei Nationalities' Movement to the South in the Period of Han Dynast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Hun

LI Sh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0,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Wuhuan and Xianbei tribes originally belonged to Donghu League.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Donghu, the remnant fled to Mount Wuhuan and Mount Xianbei. Therefore, the names of Wuhuan and Xianbei began to appear in China's historical books. After Emperor Wudi in Western Han dynasty counterattacked the Hun, Wuhuan and Xianbei nationalities haunted by the Hun began to move to the south bordering the Han nationality's sphere of influence. The reasons for Wuhuan and Xianbei nationalities' movement to the south had a lot to do with the change of strength between the Hun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In addition, they had long been expos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And they had been deeply integrated to the Han culture. The other reason for their moving to the south is the change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which made them leave their homes and move to the south to find proper pastures. The southern movement of Wuhuan and Xianbei nationalities to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Han nationality exerted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n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Key words:** Han dynasty; Wuhuan; Xianbei; southern transference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胡。早在西汉建立之初,匈奴部族便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挥兵南下,直指中原。由于国力衰弱,无力对抗匈奴,汉高祖不得不采纳刘敬的建议进行和亲,以换取边疆的安定。武帝即位后,在雄厚国力的支撑下,三次重兵出击匈奴,又在东西方向瓦解匈奴联盟,西联乌孙、月氏,东迁乌桓,最终迫使匈奴势弱北徙。东汉时期,政府继续执行西汉以来的

对匈政策,联合乌桓、鲜卑攻击匈奴,最终使其彻底退出了北方草原,长达三个世纪的匈奴之患消失了。乌桓、鲜卑即是在两汉对匈奴的打击政策下南迁的,他们乐于南迁,一是可以摆脱匈奴的奴役,二是有利于部族的发展壮大。乌桓、鲜卑南迁从战略上瓦解了匈奴联盟,削弱了匈奴力量,同时增强了汉朝的军事力量,彰显了汉朝声威,对汉匈战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2-03-08

作者简介:李 莎(1985-),女,陕西西安市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 一 乌桓、鲜卑南迁原因

### (一) 匈奴残酷奴役

乌桓、鲜卑从东胡联盟脱离后,就一直受匈奴的奴役剥削。史载:“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sup>[1]2981</sup>由于受匈奴奴役,乌桓每年必须向匈奴奴隶主进贡大量的牛、马、羊,如果数量不够或是错过规定的时间,匈奴奴隶主就把乌桓人的妻子和子女收为奴隶。此外,此地区一年里气候变化无常,时常会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如蝗灾、旱灾、风灾、雪灾等,如果牲畜得不到精心的照料就会死亡大半,乃至赤地千里、人相食。乌桓族不仅要面对自然灾害,而且还要面对匈奴族的残酷压迫,无疑是举步维艰,挣扎在死亡线上。所以“辄没其妻子”,对本来就人口较少的乌桓族来说,近乎一种种族灭绝的政策。西汉末年,王莽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引起边境冲突。乌桓人以王莽之令为理由,拒绝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并将收税的匈奴使者及其随从人员杀害。匈奴乌珠留单于派左贤王攻击乌桓,杀了一部分乌桓人,又掳掠妇女、弱小千余人。乌桓人无力反抗,只得持马畜、皮布去赎族人。两汉交替之际,匈奴复盛,重新控制了边境诸郡乌桓及塞外鲜卑,迫使其出兵侵扰汉边。鲜卑虽然于东汉初才与中原有交往,但是之前也同乌桓一样受匈奴奴役。《后汉书》载:“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sup>[1]2985-2989</sup>檀石槐父亲在匈奴军中从军三年,可知鲜卑人经常为匈奴出兵打仗,很可能还要充当匈奴的奴隶为其放牧或做家庭事务,并且每年向匈奴进贡各种名贵的动物皮毛和缴纳其他赋税。

匈奴对乌桓、鲜卑部族的奴役,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由于乌桓、鲜卑部族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权组织及军事力量,所以无法反抗匈奴的压迫。但是一旦匈奴势力衰弱,他们就会趁机反抗,摆脱其奴役。

### (二) 汉匈力量转变

汉匈力量的转变,是乌桓、鲜卑得以南迁的前提条件。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朝主动出击匈奴的战争达11次,共虏获匈奴人口22万,期间决定性的大战有三次。第一次,河南之战(前128)。汉朝完全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并且设置朔方郡,修缮秦代长城,完善了北方防御体系,而匈奴失去此地意味着丧失了大片优良牧场和南下中原的跳板。第二次,河西之战(前121)。汉朝不仅获得了一大片宜

耕宜牧的土地,增强了抵御匈奴的力量,同时隔绝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断了匈奴右臂。第三次,漠北之战(前119)。卫青率大军北出定襄,至今阿尔泰山,与单于主力大战,单于不胜,被迫西逃。霍去病率大军出代、右北平以北二千里,大破匈奴左贤王,封狼居胥山而还。这次战役使蒙古高原南部的匈奴纷纷北移、西迁,出现了汉朝边境无匈奴的景象,彻底扭转了汉弱匈强的局面。击败左贤王后,汉武帝迁徙乌桓到五郡塞外,对其进行拉拢与控制,一是巩固新得匈奴地,防守北边,让乌桓成为汉朝在北边的屏障;二是监视乌桓,防止其与匈奴联合,以断匈奴左臂。

公元46年,匈奴单于舆死,左贤王蒲奴自立为单于,引起政局不稳。之后,匈奴境内连年遭遇旱灾、蝗灾,以致赤地千里,疫病流行,人畜死亡大半。天灾人祸,导致匈奴衰弱,此时乌桓又出兵反击匈奴,匈奴北徙,漠南地空。一系列因素加剧了匈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最终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统管匈奴南部的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单于,袭呼韩邪单于之号,率众四、五万人,南移至五原郡,并上书光武帝,“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sup>[1]2942</sup>东汉政府接受其请求,并正式封比为南单于。南匈奴的归附,使乌桓、鲜卑得以脱离其控制,转向汉朝。建武二十五年(49),“辽西乌桓大人赦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sup>[1]2982</sup>此后不断有塞外乌桓人归附东汉,东汉政府令其内迁缘边诸郡,给其大量衣食物品,并派官员管理,又将其骑兵编入边郡军队,选其精锐之士作为皇宫警卫。

### (三) 汉化较深

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也是最能将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自古周边少数民族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断向中原靠拢。乌桓、鲜卑长期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为最后融入中原奠定了基础。

乌桓人较之鲜卑人汉化较早较深。汉高祖时,卢绾以“习胡事”被封为燕王。高帝死,“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sup>[2]2639</sup>汉人卢氏率领部众统治东胡五十年之久,对于乌桓、鲜卑的汉化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汉朝每新设郡,就迁徙内地人前往开发、驻守,长此以往,边郡成了汉、匈奴、乌桓、鲜卑等族的杂居之地。两汉交替之际,中原内战,边郡许多汉人逃亡塞外,与乌桓人、鲜卑人杂居相处,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文明制度,促进了乌桓、鲜卑族的汉化。

考古遗存也反映出乌桓人、鲜卑人深受汉文化影响。1956年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的属于汉代的数以万计的乌桓遗物中,铁制物品数量最多,而且大

量铁器都具有中原特色,如汉式的环首长铁刀、环首小铁刀和小铁锥之类数量达250多件。“从西岔沟出土的铁镢、铁斧、铁铤、铁锄等农具来看,证明乌桓人的确有农业。这些农具大多来自中原汉族(其中铸有汉字),说明乌桓人的农业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农业技术可能就是从汉人那里传入。”<sup>[3]14</sup>此外,考古发现鲜卑墓葬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铜铁器物,如铜饰针、铜扣、铜手镯,还有甲片、鸣镝等。

乌桓、鲜卑与汉族交往语言障碍较小,是其汉化较深的重要体现。燕国开地千里,置五郡,大量汉人徙往北边,加之后来内地汉人不断流向塞外,塞外形成了一个汉人与乌桓、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区。长期的融合使得之间的语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区特点的语言。“这些汉人所操的语言,据西汉人扬雄所编写的《方言》考证,就是流行于古代燕国、北燕、代国、远至朝鲜洌水之间的汉语方言。”<sup>[3]35</sup>马长寿先生推断,其中可能包括一些阿尔泰语系的词汇,而这种语言也许成为南迁后乌桓所持的汉语语言。语言障碍较小,加快了乌桓、鲜卑族融入汉文化圈的脚步。

综上所述,乌桓、鲜卑族一直与中原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们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进的中原文化是他们南迁的巨大吸引力,靠近中原,更方便他们的生活,更能促进其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 (四) 地理环境变化

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乌桓、鲜卑部族的南迁一方面是地理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气候变冷,使得他们不得不南下寻找更好的宜牧地区。

乌桓与东部鲜卑南迁前,主要活动于西辽河流域的森林草原地带,“北起西辽河北岸巴林左旗,南到西拉木伦河以北,西起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东至辽源。在此范围内,主要包括西辽河、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等地理区。”<sup>[4]198</sup>且西辽河一带多沙丘,南岸就是科尔沁沙地,其间有草原低地与冲击平原,是半农半牧区。西面靠大兴安岭南麓,东麓的地区多森林,南方的燕山地区由中低山丘陵与盆地构成。在这个多元的地理环境中,他们的“主要经济生态区是大兴安岭东麓、东南麓与大小凌河、燕山北麓的丘陵森林与草原地带”。<sup>[4]198</sup>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由于放牧需要依季节而转换不同草场,且照料牲畜、寻找草场与水源、应对季节变化与灾害等需大量人力,故在多山多丘陵多森林野兽的地理环境,他们不可能蓄养较多牲畜。作为游牧民族,这样的地理条件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拓跋鲜卑最初生活于大兴安岭深山中,嘎仙洞发掘的器物遗存多是打制石器、骨器、陶器,没有铜铁等金属器物,且发现了大量的兽骨,但是没有牛、马、羊骨,说明当时的拓跋鲜卑部族生产力低下,没有形成发达的畜牧业,仍处于原始游猎经济时代。由于深处大兴安岭,限制了部族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拓跋鲜卑首领率部众离开大鲜卑山,“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sup>[5]2</sup>此处的大泽是由大片的沼泽地及众多的小湖泊构成,并不适合游牧的鲜卑部族,所以他们继续南迁。

气候变冷变干,使得乌桓、鲜卑部族面临牧草减少、灾害频繁的恶劣环境,他们不得不南下寻找新的宜牧地区。据地理气象学家研究,我国秦汉时期处于温暖湿润期,但是从当时气候变化看,西汉中期以后,我国气候就逐渐趋于寒冷。据王子今先生考证,“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之间,有关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灾异的历史记录多达20余起。”<sup>[6]64</sup>这种严寒天气同样波及到北方草原地区。公元前71年,匈奴击破乌孙返回途中遭遇大雪,冻死数万人。曾经是草原霸主的匈奴都无力抵抗自然灾害,更何况是乌桓、鲜卑。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他们面临的自然灾害,但是从匈奴的情况可以推断,乌桓、鲜卑的生存状况同样很严峻。由于地处东北,首当其冲就是严寒天气。寒冷天气的持续,使得地面冻土加厚,牧草生长期变长,不利于放养更多牲畜。另外,严寒天气会导致旱灾、蝗灾增多,使得草原上草木干枯,赤地千里,牲畜死亡。作为游牧部落民族,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南迁,靠近中原地区,寻找更适合的宜牧地区。

## 二 乌桓、鲜卑南迁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 (一) 瓦解了匈奴联盟

乌桓在南迁前一直受匈奴控制,不仅每年向匈奴进贡各种物品,而且经常被迫出兵与匈奴侵扰汉朝北方边境。乌桓骑兵又是天下强兵,一直充当匈奴在东方的重要军事力量。汉武帝出击匈奴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乌桓的军事力量,因此才会在击败匈奴左贤王后,将乌桓迁徙到长城一线管理。《后汉书》载:“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sup>[1]2981</sup>汉朝设置护乌桓校尉一职,并持节监管,防止其与匈奴沟通,再次威胁汉朝边境稳定,并与其互市,密切经济联系,此外允许乌桓首领每年朝见汉帝,从政治、经济方面扶植乌桓,使其成为汉朝的防御屏障。



其后,乌桓在西汉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强大,昭帝时挖了匈奴祖坟,以报冒顿灭族之仇。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乌桓乘匈奴社会混乱,出兵攻击匈奴,使本来就衰弱的匈奴雪上加霜,被迫向北逃去。光武帝趁机扶植乌桓,经济上赐其大量珍宝、衣服、粮食,并让其迁居塞内,广布缘边各郡,政治上封其首领为王、为侯者达八十多人,并恢复西汉的护乌桓校尉制度,在上谷宁城开设营府,监管乌桓、鲜卑赏赐,质子及与汉互市等事务。

鲜卑在东汉初期,经常与匈奴联兵侵扰汉朝北边,杀略吏人,掠夺财物,无有宁岁。公元48年匈奴分裂,统属南边八部的南匈奴附汉,鲜卑遂主动遣使通汉。东汉政府加封鲜卑首领为王、侯,并赐其大量珍贵物品,令其助汉攻击北匈奴及塞外未归附的乌桓。这一政策吸引了众多鲜卑人南下附汉。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族人朝贡,表示归附。光武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sup>[1]2986</sup>“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彩缯各有差。”<sup>[1]2987</sup>大量鲜卑部族的南下附汉,使匈奴失去了在东方攻击汉朝的军事力量。此后乌桓、鲜卑与南匈奴在汉朝的支持下,不断攻击北匈奴,使得北匈奴在漠北难以立足,遂逃往安侯河以西。

乌桓、鲜卑南迁附汉,以及南匈奴内迁,不仅使匈奴失去了军事臂膀,瓦解了匈奴联盟,而且使汉朝在北方边境上建立了一道军事防线。两次迁徙后,乌桓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一带,东部是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部是上谷、代郡、雁门、西河、云中、朔方。东汉后期,乌桓在北方边境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军事势力,史载:“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百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sup>[1]2984</sup>鲜卑最初游牧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乌桓南迁后就逐渐到了辽东等五郡塞外,与乌桓相邻,随着乌桓不断内迁、南匈奴附汉,鲜卑逐渐向西迁徙,到了河套阴山一带。这样,沿长城一线,就形成了乌桓、鲜卑、匈奴及边境汉人的杂居地区。当汉朝防御或攻击北匈奴时,活跃在长城内外的乌桓、鲜卑及南匈奴的骑兵,俨然汉朝北方边境的又一条万里长城。这些骑兵队伍灵活机动,又骁勇善战,汉朝指挥他们无疑是有了战胜匈奴的利器。东汉中后期,乌桓、鲜卑经常与汉联合,或是攻击北匈奴,或是镇压南匈奴的反叛者。由此可见,在瓦解匈奴联盟、阻止南北匈奴联合方面,乌桓、

鲜卑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随着鲜卑的逐渐强大,塞外匈奴失去了生存空间,匈奴最终消失。

## (二) 增强了汉军实力

乌桓、鲜卑的南迁,战略上瓦解了匈奴联盟,打击了匈奴政治声望,军事上增强了汉军实力,“一是弥补了汉军的兵员不足和某些缺陷,改变了汉军中的兵员结构和兵役制度,二是革新了汉军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提高了汉军的战斗力。”<sup>[7]35</sup>汉朝军队多以步兵为主,实行车战,而乌桓、鲜卑民族则是骑兵,他们精通骑射之术,灵活机动,作战迅速,战斗力强。两汉政府在制服匈奴的战争中,经常利用游牧民族的骑兵充实汉军。如东汉时期就经常利用乌桓、鲜卑、高句丽及西北的羌胡、西域诸国兵出击匈奴,在攻打塞外乌桓时则用鲜卑、南匈奴兵,攻打鲜卑时多用南匈奴和乌桓兵,而且乌桓骑兵天下闻名,在刘秀统一全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汉书》载:“光武将发幽州兵……即拜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光武北击群贼,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sup>[1]676-679</sup>在平叛王朗时,光武帝发渔阳、上谷两郡骑兵四千余人,结果大破王朗兵,斩首三万多级,可见乌桓骑兵作战非常勇猛,甚至东汉末年的蔡邕都赞乌桓突骑是天下精兵。

西汉武帝击败匈奴左贤王后,遂迁徙乌桓,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以监管,实际上是利用其优势兵力来抵御匈奴。宣帝以后,乌桓一直助汉攻打匈奴及镇压各方叛乱。王莽时期,还征用乌桓兵攻击匈奴。东汉时期,政府从归附的乌桓人中选出一部分编为宫廷卫士,执行保卫皇宫的警戒任务,由胡骑司马协助统领。此后,乌桓由汉朝指挥,出击匈奴或与南匈奴合力攻击北匈奴,如“建初元年……时皋林温禺犊王复将众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知,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sup>[1]2949</sup>

南匈奴附汉后,鲜卑才得以转向汉朝,主动遣使通汉。东汉政府趁机示以财利,封其渠帅为王、侯者达八十多人。鲜卑的附汉,为汉又增加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鲜卑大都护偏何主动向汉请功,汉朝命其出击北匈奴,结果偏何大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级。此后鲜卑诸部年年攻击北匈奴,并持匈奴人首级到辽东受赏。章和元年(87),“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sup>[1]2951</sup>这是鲜卑进攻北匈奴的又一次大胜仗,从此,北匈奴放弃龙庭,向西逃去,到了今阿尔浑河以西。公元94年,新降胡二十余万人反叛,胁迫前单于屯屠何子逢侯为单于,杀略

吏人,焚烧边塞亭障,汉朝遣大军及乌桓、鲜卑兵合四万人征讨,结果大破匈奴兵,斩首一万七千余级。

乌桓、鲜卑的归附,不仅为汉增加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增强了汉军的实力,遏制了北匈奴的南下侵扰,阻止了南北匈奴的联合,而且减少了中原内地人民的兵役负担和后勤运输,为东汉政府节省了军费开支。

### (三) 提高了汉朝政治威望

西汉统一初期,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正值兴盛,史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时常兵临汉边,挑衅示威,而其首领自称为天地日月所赐草原天子,傲慢蔑视汉帝权威。相比之下,汉朝无法与其强大的兵力抗衡,不得已实行和亲政策。从此匈奴更是骄傲自大,肆意奴役草原各部族,西自西域诸国东至辽东乌桓、鲜卑,无不唯其马首是瞻。汉武帝反击匈奴后,匈奴连连败退,主力受创,不得不北迁西逃,尤其是左右贤王控制下的被奴役部族的反抗和附汉,使得匈奴昔日草原霸主的威望一落千丈。

武帝初击破左贤王后,把乌桓迁徙到长城外,并设置校尉制度进行管理,控制了匈奴东方,使其无法再兴战事。乌桓的臣服及为汉保塞、攻击匈奴,使得匈奴无法在东方耀武扬威,从此势力转向西北,加剧了对西域的压榨剥削,由此影响了西域诸国对匈奴的态度。此后,汉武帝又遣使联合西域,派大军击破匈奴右贤王,置河西四郡,徙民实之,又征伐大宛,自此西域震惧。宣帝本始元年(前73),汉朝又联合乌孙出兵攻击匈奴,匈奴闻汉兵出,老弱奔走,驱牲畜远遁。此战捕获单于父及名王以下三万九千级,马牛羊等七十万头,从此匈奴势力衰弱,政治威望持续下降,匈奴内部自单于以下常有和亲之愿。后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称臣纳贡。至此西汉持续六十多年的对匈战争结束,匈奴长久以来对汉的威胁得以解除,大汉威望自此提升。

东汉初期,匈奴社会遭到连年天灾,人畜死亡大半,疫病流行,以致赤地千里、人相食,又被乌桓攻击,由此北徙。此后,统治阶层内部争立单于位,加之社会衰弱、外部攻击,最终分裂。南匈奴的附汉,使得匈奴无力再控制东部地区,乌桓、鲜卑重新遣使通汉,称臣纳贡,成为汉朝北边的防御主力。塞外乌桓先后南下,散居北边十余郡内,听从东汉政府统一指挥,与汉军一起出击鲜卑和北匈奴。此后,鲜卑诸

部主动归附,出兵攻打北匈奴和骚扰汉边的赤山乌桓。乌桓、鲜卑的附汉,及为汉出兵连年攻打匈奴,使得塞外其他部族纷纷脱离匈奴控制,转向汉朝。一时间四方蛮夷纷至沓来,至洛阳朝贺,而塞外野无风尘,边境息警,汉朝国威由此远播四方。

### 三 结语

总之,乌桓、鲜卑的南迁与汉匈战局息息相关。首先,汉匈力量的转变是他们南下的前提条件,匈奴势力的衰弱,使乌桓、鲜卑部族得以摆脱其奴役,南下寻求自身发展空间;其次,乌桓、鲜卑部族长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汉化较深;最后,汉朝恰当的民族政策,使其愿意臣服。他们的南下在汉朝最终战胜匈奴的战争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附汉称臣,接受汉朝的统一领导,为汉保塞,使匈奴失去了重要的军事力量,无力在东部发起大规模对汉战争,保证了汉朝东部边境的稳定;他们助汉攻打匈奴,影响了周边其他受匈奴奴役的部族,导致匈奴统治内部混乱;他们南下附汉,彰显了大汉朝的国威,使其政治影响远播四方,导致匈奴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心理,最终内部分裂,南部归汉,加速了匈奴军事联盟的瓦解,加快了汉朝战胜匈奴的脚步。汉朝正确处理了乌桓、鲜卑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归属问题,如设置校尉及专职官员进行管理,并从经济和政治上扶植其发展,利用汉朝先进的物质文明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促进了民族融合,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为后来历代王朝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 参考文献:

- [1] 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 [4] 王明珂.北方游牧者的抉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5] 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7] 上官绪智.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的具体运用及其影响[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35-42.